

前两天听了一个故事，大概意思如下：说有个修炼人买菜，回家后发现少了斤两，问应该如何去对待。有三种答案，第一是去找那个卖菜的人算账，不能吃亏；第二就是不去找了，忍了算了，吃亏是福；第三种是回去找那个卖菜的人劝善，告诉她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并告知善恶有报，害人终害己的道理，从根本上拯救提升这个生命。



事情虽小，但三种答案，对应着三种境界，第一种完全是看重个人利益的想法，为修炼人所忌；第二种是晓知佛家因果，而不起争执计较，比起第一种行为有所提高，但是隐藏着私心，对于过去一般的修炼人来说，我想这也是很不简单的了；但第三种行为才是更高的认识，完全没有个人的得失之心，完全为了别人的生命负责任，这才是了不起的行为和境界！

十年前，我参加了“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当时我们整整齐齐地站在人行道边上，一个行人过

来问我们干什么来的，有学员简单给他讲了天津抓人、打人的事，这个人问：“你们法轮功不是讲忍吗？被欺负了忍忍不就算了？共产党可不是好惹的。”我听见旁边一个学员平静地说：“如果一个恶人在施暴，你不去管他，他还会欺负别人的。”很普通的一个道理，十年后的今天，更多的人才真正理解到这就是和平理性抗争下的道德意义。

因信仰法轮佛法，被中共迫害中，我曾被非法抓捕、判刑。非法审讯时，一个预审在听到我陈述上访的理由后，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了一句：“都这时候了，你倒还能想着别人！”在被押送到劳教所的路上，我利用仅有的半个小时机会给押送我的警察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谎言，他制止了我两次，我说，“今生今世说不定就这半个小时的缘分，就听我说两句吧，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不再吭声，直到到达，对我说：“都这样了还给我讲！”我微笑着问他：“是啊，你说我图啥呀？”话音未落，我突然看见他的眼睛中充满了泪水。（文/罗娜）



“反动”是中共打击异己所用的一句口号，奇怪的是在中共统治的地方，人们一谈起“反动”，马上噤若寒蝉，自己也以为犯了什么大罪似的。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试为大家说之。

从中文上考证“反动”之意蕴，老子《道德经》的一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恐怕是“反动”的最早的意思，没有任何让人觉得“反动”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感觉。

打个比方：某天，甲、乙、丙、丁四人出去旅行，分别向东、南、西、北的方向运动；那么甲是丙的反动，乙是丁的反动，反过来说，丙是甲的反动，丁是乙的反动。

这么多的“反动”走在一起，可是谁也不会觉得甲是丙的什么罪人，丙是甲的什么罪人，而乙、丁二位也甚觉自然不会把与对方的反动当成敌意。

可是在中共的眼里，反动成了一项罪名，但具体是什么罪名，中共也说不清楚，大约是说某人之坏，“坏极坏极”，但具体怎么一个坏法，却也说不出来。

其实中共之所云的反动不过就是与中共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中

“反动”漫谈

共，这在社会中是挺自然的事情，因为事物皆有两面性，中共所喜欢的不见得大众都喜欢，中共所反对的不见得大众都反对，这又有什么错？

可是中共毕竟是邪教，没有正常人的理性与文明，在它认为凡是反对它的就是有罪的，就是“反动”的。

于是乎“反动”在中国成了一个禁忌，人人谈之而色变了。

另外，中共所定义的“反动”与它以前定义的“反动”矛盾。

譬如说：苏维埃时期的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也就是追求国家分裂、国中有国，所以外蒙古在苏共挑唆下独立时，中共还发了贺电支持，但现在中共却反对“国家分裂”了，并以此为“反动”；抗战时期的中共高喊“民主与人权”，现在却以议论、要求“民主与人权”为“反动”；在五、六十年代，中共以资本、私产为“反动”，天天杀人，现在却鼓励资本家入党了；七十年代被打倒的反动派，到八十年代中共又说他们不“反动”了。

也就是说中共之“反动”没有

固定的定义：中共，不但在时间上自我“反动”，它的内部成员也相互“反动”，极象古代寓言的两头蛇，一个头要这样走，另一头要那样走，最后两个头打了起来。

中共连自己都是它所说的一个“反动”，哪还有什么资格以“反动”去压服别人呢？其实，中共所说的“反动”就是其随心所欲制造的为镇压百姓，折腾百姓的一个恐怖借口而已。（文/苏凰）◇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引自《九评共产党》

我当姑娘时就爱打架，什么也不怕，哪天都有人找上门来，十里八村都知道我的霸道，爸妈为我把心都操碎了。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姑娘打在一起，她被送去医院，花了很多钱。我的父母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把我打死了。爸说你这样的姑娘白给别人都没人要。真说对了，我真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

最后，终于找到了对象，这家兄弟三个，我嫁的是老三。婚后，是姜改不了辣味，我还那样霸道，当着丈夫、哥哥、公婆的面，嫂子被我打得不象样，拿着扁担把大伯哥打得满街跑。有一次，我丈夫的领导对他不公平，我跑到他单位把他领导也给打了。我一打起架来就谁也不怕，不管辈分长幼，权势高低，一律都敢打骂，周围知道我脾气的人都怕我，在家我说一不二，丈夫被我管得一点脾气都不敢有，人送我外号“母老虎”。

婚后几年，由于生活压力，身体逐渐衰弱，多种疾病接踵而来，我成了医院的常客。这期间，CT做了两次，结肠镜做了一次，胃镜做了三次，医院的仪器没有没做过的。找一个专家大夫看后，说：你是神经功能紊乱，医院没法治了。我又找有附体的假气功师治，也没好。病痛的折磨使我生不如死，体重只剩八十几斤，服过两次毒药寻死，都没死成。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法轮功，我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想法去炼，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人也能吃饭了，不到一个月，我完全恢复了健康。现在的我，红光满面，走路生风，什么活都能干，五十岁的

“母老虎”变成贤妻良母

文/辽宁省大法弟子



人看上去就象三十几岁。

当然，变化最大的是，我知道怎么按照“真善忍”去生活了。我亲自去给哥哥、嫂子赔礼道歉，亲自去给村子中被我打伤过、被我骂过的人赔礼。通过我的变化，二嫂说：“谁要说法轮大法不好，我就敢跟他们评理，我不看别人就看老三的媳妇，自从学大法后，整个人改头换面，身体也好了，性格也变了。”二嫂家的女儿说我是贤妻良母，与邻居之间的交往中传出的是真诚的话语、开心的笑声，他们都说我变

成另一个人了。

我家的房子搬迁，按照地方补偿标准给钱。大家都去领钱，我领后，算了一下却多出一千七百元，我急忙又回到领钱处，说给我的钱不对。当时给我钱的人还说：“给你的怎么不对？”我说你们多给了我一千七百元。全屋的人都惊呆了，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大法的。

九九年七月，迫害来了。我要不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也太没良心了。我去北京上访，回来被抓进看守所，非法罚我八千元。

还有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戒毒所，当着几百人的面，我被堂姐的儿媳妇给打了（警察指使的）。被打后，我泪水流出来了，很委屈。但我忍住了，我只觉得她们很可怜。曾经有两年我被中共迫害得有家不能回。我家人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女儿吓得失眠，丈夫经常伤心。尽管如此，我的丈夫仍然支持我炼法轮大法，并从心底念着：法轮大法好！镇上的领导请我丈夫吃饭，饭后让我的丈夫替我签字说不炼，我的丈夫一直没签！◇

深州市公安局执法犯法，无理抓人

【明慧网】在邪党两会期间，深州市公安局对大法弟子进行了新一轮的迫害。二零零九年三月一日是深州市大集，来赶集的法轮功学员碰到一起就说上几句话，竟被便衣警察绑架。有的就是在此路过，走着路就被抓了。

此次被绑架的共有十余人，其中包括张瑞峰（深州市人），西景明村小文、小芳、小七、艳丽，唐奉乡刘兰朵、小茶、大娟，双井乡郭小梅、小新、瑞景，焕准于前一天被抓。这次绑架事件是由公安局副局长兼国保大队大队长赵涛、国保大队张德纯策划参与，并指使恶警杨小丢、叶宪峰、刘增琪等人所为。其中张瑞峰、刘兰朵被他们打的很严重，恶警不但对大法弟子大打出手，还让刘兰朵下跪，刘兰朵不跪，恶警一脚把她踹倒在地，兰朵当时就起不来了。十多天后腿上的青紫还没有完全消退。

公安局绑架这些大法弟子后将他们全部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大法弟子被强迫奴役劳动，他们还将李艳丽、刘小七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利用犹大史从军、李志勇、高威等人围攻迫害，一天一夜不让睡觉。到目前为止，张瑞峰已被非法判劳教

一年九个月，刘兰朵被非法判劳教一年三个月，于4月23日分别被送往衡水市看守所和石家庄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其余大法弟子已被勒索1—6千元不等放回。

公安局对赶集过路的这些法轮功学员以“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进行勒索和关押。深州市善良的乡亲们，国家法律是由谁来实施的呢？不正是由公安局和执法机关吗？那谁又能破坏的呢？所以说，破坏法律实施的不是法轮功学员，而是公安局等执法机关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执法犯法，滥用罪名，勒索钱财，老百姓想一想都会明白的。

请深州市的乡亲父老伸出援助之手，和我们一起，共同制止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



恶行 记录在案